

基于“理性人”假设的农户耕地撂荒行为 影响因素

——来自 2010 CGSS 数据的实证分析

聂鑫^{1,2}, 肖婷¹, 缪文慧¹, 汪晗¹

(1. 广西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广西南宁 530004; 2. 广西大学 中国-东盟研究院, 广西南宁 530004)

摘要: 利用 2010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 通过理论分析与数据挖掘, 运用 Binary Logistic 模型检验并探讨农户耕地撂荒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 作为“理性人”的农户, 其耕地撂荒行为受到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生产资料费用总支出比率、农户家庭总支出和总余额、土地流转情况、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等因素的影响。其中, 最突出的是个人特征因素和养老保险制度因素。基于此, 研究提出诸如: 制定对农村青年劳动力的专项扶持政策, 提高农户对保护和集约利用耕地的认知程度, 加大对教育、医疗和农业设施的投入, 制定差异化的土地流转政策,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制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 理性人; 耕地撂荒; 影响因素; Binary Logistic 模型

中图分类号: F321.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4210-(2015)03-134-09

Factors of Farmers' Behavior of Abandoning Farmland Based on Rational Person Hypothesi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Data from 2010 CGSS

NIE Xin^{1,2}, XIAO Ting¹, MIAO Wen-hui¹, WANG Han¹

(1.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4, China;

2. China-ASEAN Research Institute of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4,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from CGSS in 2010, this paper applies binary logistic model to study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behavior of farmers' abandoning farmland through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data mining. Results show that as a "rational man", the farmers abandoned farmlan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ge, level of education, health, the ratio of production costs on total expenditure, the total expenditure and the total balance of farm households, the land circulation situation, medical insurance, endowment insurance. And among the factors, personal factors and the endowment insurance system affect more. Based on the results, the authors put forward some policy

收稿日期: 2014-12-22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36300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CGL109); 广西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13GXNSFBA019214);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12YJC790144);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0JZD022); 广西大学 211 工程四期重点学科群; 中国-东盟经贸合作与发展研究项目(dmyjy201327)

作者简介: 聂鑫(1983—), 男, 副教授, 博士, 从事国土资源规划与可持续发展研究。E-mail: toefl678@163.com

通信作者: 汪晗(1988—), 女, 副教授, 博士, 从事农村土地经济与管理研究。E-mail: hanhan880625@163.com

suggestions such as developing the special supportive policy for rural youth labor, raising farmers' awareness of protecting farmland and intensive use of arable land, increasing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health care and agricultural facilities, developing differentiated land transfer policy, improving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n rural areas.

Key words: rational person; cultivated land abandoned; influencing factor; binary logistic model

伴随经济的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农村耕地撂荒现象日益凸显,并呈现面积扩大、周期变长、由隐性到显性发展的新趋势^[1-3]。虽然我国在较长时间内实现了粮食产量的相对稳定和小幅度提升,但在技术没得到重大突破的情况下,保证充足的耕地播种面积依旧是保障粮食自给率的关键因素。耕地撂荒^①作为一种粗放用地中的极端不利用耕地行为,不仅导致耕地质量和生态经济功能衰退^[4],也造成了土地资源分配效率低下,危及到了我国的粮食安全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5]。是何种原因导致农户撂荒行为的产生?国内学者从定性的角度分析认为:农业比较效益低、农业种植机会成本大、土地流转机制不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等,在不同程度上导致了撂荒现象的产生^[6-8]。有部分学者尝试通过定量模型工具来研究农户撂荒行为。曹志宏通过实证研究表明社会经济环境(主要是农业比较收益)对农户撂荒耕地现象产生了决定性作用^[9]。谢秋山运用 Multinomial logistic 模型从家庭劳动力配置的角度分析农户土地处置方式的差异,结果表明外出务工劳动力数量越多,农户土地流转和耕地撂荒的倾向就更高^[10]。郑兴明以福建省 365 位农户的调查数据为依据,证明了农民“风险厌恶”的特点导致了耕地撂荒这一理性决策行为的产生^[5]。国外学者则运用统计分析法对土地撂荒行为的多维驱动力(生态环境维度^[11]、社会经济维度^[12-13]、社会组织、政府制度维度^[14])进行研究,此外,部分学者认为耕地撂荒也具有减少土壤侵蚀、控制地表的径流量等积极影响^[15]。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学界对于农地撂荒行为的研究中,国内学者较多集中在宏观政策对农地撂荒行为的定性分析上,较少有定量研究,即使有部分实证定量研究,也存在抽样样本较少(多集中某一省域或县市)、缺乏对撂荒决策主体——微观农户的关注等缺陷。而国外学者的研究虽重视量化框架的选取,但分析重心偏向于生态保护、自然资源管理等宏观因素,介于此,笔者尝试从以下两个方面体现研究的创新:①通过理论框架的搭建更加系统和全面(不仅包括宏观外部因素也包括微观个体因素)地分析耕地撂荒问题,并运用 Logistic 模型进行假设检验;②使用的数据与其他相关研究相比,数据样本量大,在调查的空间范围上更具代表性,从而使得结论更具一般性和普遍性。

1 理论模型构建

T. Schultz 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论证了农民最大目标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其行为的动机与市场经济微观经济主体的动机一样^[16]。S. Popkin 认为农户是一个权衡了长期和短期利益及风险因素后,为追求最大利益而做出合理决策的“理性人”^[17]。因此,我们认为农户土地撂荒行为是理性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利益,其决策行为不仅取决于个人特征,也受到家庭劳动力配置、经济因素和社会制度框架的影响^②。结合相关学者的研究,笔者从内部和外部两个维度来剖析农户撂荒行为。

①谭术魁认为土地撂荒可分为明荒(显性)、暗荒(隐性)两种类型。由于暗荒(隐性)不便直接度量,本文定义的土地撂荒是指明荒(显性)。

②曹志宏提出我国社会制度和经济环境对农户撂荒耕地现象的影响要远大于耕地资源禀赋对其产生的影响,所以本文不考虑耕地资源禀赋对撂荒行为的影响。

1.1 内部指标

个人特征:农户是使用和保护耕地的最直接主体,其个人特征差异是导致农户决策不同的主观原因。学术界就个人特征对耕地抛荒的影响存在一定争议:郑兴明等学者认为年龄较大、学历较低的农户,收集信息和学习技术的能力越弱,他们倾向于固守农业种植,减少撂荒行为发生^[5];而钟晓兰等学者认为文化程度越高的年轻农户对农业的依赖越小,从事非农产业的机会就越多,土地流转的意愿越强,因此耕地撂荒的可能性越小^[18]。个人特征到底如何影响农户抛荒决策?本文选取了影响方向有争议的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两个因素外,还选取了农户性别、健康状况指标来进行分析。

家庭劳动力配置:从劳动力供需的角度来看,撂荒的实质是由于耕地和劳动力两种生产要素的非均衡配置所导致。针对此,肖冬华的研究表明,农村年轻劳动力迫切希望进城务工获取更多的经济收入,导致农业生产主体呈现老龄化趋势,农村劳动力流失严重,影响农业产业种植^[19];另外,田千禧认为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劳动力产际间和行际间的流动步伐加快,使得农业劳动力大量流向第二及第三产业^[4]。相关调查与统计分析表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而导致的农村劳动力减少,是农村耕地撂荒的主要原因^[6-7]。为此,笔者选择了有劳动能力的人数、参与劳动生产的人数和劳动力外出量等因素作为此项研究的指标。

1.2 外部指标

经济因素:作为“理性人”,农户对于耕地处置的决策主要是基于农业和非农业经营收益博弈的结果,该结论得到了大部分学者的认可,并通过进一步的实证研究表明,农业经济效益的比较利益低下是耕地撂荒最根本的驱动因子^[8,16,20]。同时,也有学者指出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是农地经营者对农地进行经营的核心驱动力,经营者选择将农地进行撂荒或粗放式经营,主要归因于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

差”和产业利润率比差的存在以及农业经营的高机会成本^[6,21]。综上所述,我们选取的指标包括农业收入占总收入比率、生产资料费用总支出比率、家庭总支出和总余额。

社会制度框架:农户的行为囿于制度框架,不同的制度决定了不同的经营决策。耕地撂荒问题往往可以在制度上找到其诱因,研究者普遍认为我国耕地撂荒的制度根源可以归结到以下两个方面:①在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善,土地不仅能满足农户的生存需要,而且能提供就业机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养老保险的作用。甚至,土地的心理保障功能远远大于经济保障功能^[3,7,18];②目前大多数地方土地仍处于自发、无序的流转状态,缺乏健全的土地流转机制,缺乏可操作性强的引导政策,致使劳动力外出后土地被迫撂荒^[6-7,16]。因此,本文选取了是否有医疗保险、是否有养老保险和耕地是否流转 3 个指标来研究。

结合上述分析,本文将影响农户耕地撂荒行为的因素归纳成内部和外部两个维度,包括个人特征、家庭劳动力配置、经济因素、社会制度框架 4 个大项 14 个分指标,并构建农户耕地撂荒行为影响因素分析模型(ACTION):

$$\text{ACTION} = F(\text{CHAR}, \text{LAB}, \text{ECO}, \text{SYS}) = (\text{GEN}, \text{AGE}, \text{EDU}, \text{HEAL}, \text{HLAB}, \text{ILAB}, \text{OLAB}, \text{AINCR}, \text{PRODR}, \text{TEXP}, \text{SUM}, \text{TRAN}, \text{MINS}, \text{EINS})$$

2 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2.1 数据来源

研究所用的数据是中国人民大学主持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中数百村数千户农户的调查数据。此次调查于 2010 年进行,抽样范围覆盖了 31 个省(区、市)(除港澳台地区)的城市和乡村,是全国性的数据。选取户口是农业户口且在农村有土地的农户为研究对象,经过初步样本筛选,删除了存在缺

失数据值和不合理值样本^①,最终获得剩余有效样本3 282个。

2.2 变量说明

关于因变量“耕地是否撂荒”,CGSS 2010 调查问卷中设计有这样一道问题:请您谈谈您家目前土地的使用情况?^② 具体内容包括土地的4种处置方式,即土地转出、转入、自己耕种和闲置各占有多少亩?在4类土地处置方式中,闲置度量的是耕地撂荒情况。本文选取土地“闲置”这种处置方式进行研究,意在全面考察农户耕地撂荒现状,并厘清农户选择耕地撂荒背后的影响因素。

在达到研究目的的同时为了研究的简便,本文将变量进行了如下处理:①将“田地”出现闲置赋值

为“1”,反之赋值为“0”;②将私塾归并为小学,高中包括职业高中、普通高中、中专和技校,大学及以上包括大学专科(成人高等教育)、大学专科(正规高等教育)、大学本科(成人高等教育)、大学本科(正规高等教育)和研究生及以上;③有劳动能力的人数是指样本家庭中16~65岁农户的人数;④参与劳动生产的人数包含全职参与和兼职参与劳动生产的农户数目;⑤劳动力外出量是常年外出的劳动力人数加权处理后与短期外出的劳动力人数的和;⑥农户家庭的耕地只要是进行了转入或转出都视为耕地进行了流转;⑦P代表正相关,反映指标值越大,撂荒程度越高;N代表负相关,反映指标值越大,撂荒程度越低。具体变量赋值及描述详见表1。

表1 模型变量含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

| | 变量名称 | 变量取值 | 均值 | 标准差 | 预期相关性 |
|---------|---------------------|----------------------------------|-------|-------|-------|
| 因变量 | 耕地是否撂荒(ACTION) | 0=否,1=是 | 0.10 | 0.30 | |
| | 性别(GEN) | 0=女性,1=男性 | 0.52 | 0.50 | P |
| | 年龄(AGE) | 具体数值 | 2.01 | 0.89 | N |
| 个人特征 | 受教育程度(EDU) | 1=小学及以下,2=初中,3=高中,4=大学及以上 | 1.56 | 0.72 | P |
| | 健康状况(HEAL) | 1=很不健康,2=比较不健康,3=一般,4=比较健康,5=很健康 | 3.52 | 1.172 | P |
| 家庭劳动力配置 | 有劳动能力的人数(HLAB) | 具体数值/人 | 3.72 | 1.55 | N |
| | 参与劳动生产的人数(ILAB) | 具体数值/人 | 1.71 | 1.27 | N |
| | 劳动力外出量(OLAB) | 具体数值/人 | 4.59 | 2.45 | P |
| 经济因素 | 农业收入占总收入比率(AINCR) | 具体数值 | 0.27 | 0.34 | N |
| | 生产资料费用占总支出比率(PRODR) | 具体数值 | 0.08 | 0.11 | N |
| | 家庭全年总支出(TEXP) | 具体数值/万元 | 3.00 | 4.39 | P |
| | 家庭全年总余额(SUM) | 具体数值/万元 | -0.03 | 4.14 | P |
| 社会制度框架 | 是否流转(TRAN) | 0=未流转,1=流转 | 0.25 | 0.44 | N |
| | 是否有医疗保险(MINS) | 0=没有,1=有 | 0.59 | 0.29 | P |
| | 是否有养老保险(EINS) | 0=没有,1=有 | 0.24 | 0.43 | P |

①主要剔除了“不知道回答缺失值”、“拒绝回答缺失值”或“不适应缺失值”的样本。

②这里土地分为4类(1.田地;2.山林、牧场;3.水面、滩涂;4.其他);本文选取上述4类土地中“田地”的闲置情况进行研究。

3 计量模型分析

3.1 模型选择

使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农户耕地撂荒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数据分析,且因变量为二分类变量,所以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中的 Binary Logistic 回归分析方法来建立离散变量模型。

Binary Logistic 回归模型公式:

$$\ln \frac{P_i}{1-P_i} = \alpha + \sum_{i=1}^n \beta_i x_i \quad (1)$$

$$P_i = P\left(Y = \frac{1}{x_1, x_2, \dots, x_n}\right) = \frac{\exp\left(\alpha_0 + \sum_{i=1}^n \beta_i x_i\right)}{1 + \exp\left(\alpha_0 + \sum_{i=1}^n \beta_i x_i\right)} \quad (2)$$

式中: P_i 为农户耕地撂荒发生的概率; i 为影响因素的编号; α 为常数项; β_i 为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是影响因素 x_i 增加一个单位所引起的对数优势增量,反映了其对因变量作用大小。

3.2 模型的检验结果

为了验证个人特征、家庭劳动力配置和经济因素、社会制度因素分别对耕地撂荒行为的影响,以及便于比对分析。本文将建立 3 个逐次包含的模型来进行评估。在模型 1 中包含社会制度,模型 2 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加入家庭劳动力配置和经济因素指标,模型 3 则是整合个人特征、家庭劳动力配置和经济因素、社会制度三部分指标的因子。运用 Stata 12.0 统计分析软件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的结果见表 2。

表 2 模型显著性和回归系数

| 变量 | 模型 1 | | 模型 2 | | 模型 3 | |
|-----------------|---------------------------|--------|----------------------------|--------|----------------------------|--------|
| | 回归系数 | Exp(B) | 回归系数 | Exp(B) | 回归系数 | Exp(B) |
| 常数 | -2.181*** | 0.113 | -2.181*** | 0.113 | -2.181*** | 0.113 |
| EINS | -2.153*** | 0.116 | -0.456** | 1.641 | -0.116 | 1.601 |
| MINS | -0.091 | 0.913 | -0.167* | 0.869 | -0.136 | 0.856 |
| TRAN | -2.264*** | 0.114 | -0.350*** | 0.984 | -2.424*** | 0.146 |
| PRODR | | | -1.613*** | 0.217 | -0.121*** | 1.035 |
| TEXP | | | 0.065*** | 1.063 | 0.074*** | 1.068 |
| SUM | | | 0.041* | 1.038 | 0.050** | 2.034 |
| AGE | | | | | -1.708*** | 0.208 |
| EDU | | | | | 0.375*** | 0.950 |
| HEAL | | | | | 0.719** | 1.250 |
| 似然比检验 | $\chi^2=6.946$ Sig.=0.000 | | $\chi^2=56.075$ Sig.=0.000 | | $\chi^2=61.314$ Sig.=0.000 | |
| -2Loglikelihood | 2 147.914 | | 2 098.785 | | 2 093.547 | |
| 伪 R^2 | 0.002 | | 0.017 | | 0.019 | |
| 类 R^2 | 0.004 | | 0.035 | | 0.038 | |
| 样本量 | 3 282 | | 3 282 | | 3 282 | |
| 模型预测准确率/% | 89.9 | | 89.9 | | 89.9 | |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 水平上显著。

3.3 模型的检验

由表2可知,农户耕地撂荒的3个模型均通过了似然比检验,这就意味着每个模型中至少有1个自变量与耕地撂荒显著相关。上述3个模型的 -2Loglikelihood 依次减小的同时,伪 R^2 和类 R^2 逐步增大,这说明模型拟合效果逐步增强,预测的准确性逐步提高。利用估计的Logistic模型对调查数据进行模拟分析,选择截断概率为0.5,当模型拟合概率大于0.5,则认为耕地出现撂荒,而模型拟合概率小于0.5时认为耕地没有撂荒。据此模拟结果与实际调查数据比较,2949户耕地没有撂荒的农户全部判断正确,正确率为100%,而模型整体预测准确率为89.9%,这说明模型整体预测效果不错,尤其是对那些耕地没有撂荒农户的预测。

3.4 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在进行数据检验分析之前,我们对影响农户耕地撂荒行为的理论假说方程中自变量对因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系列假定。从检验的结果来看假设与检验方程存在着一定的偏差,笔者针对这些差异重新进行思考并尝试解释其内在原因。

(1)农户个人特征对耕地撂荒的影响。农户个人特征各变量除性别(GEN)变量没有进入最终的耕地撂荒模型外,其他变量回归系数均通过了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对耕地撂荒均有极显著影响^①。

回归结果显示年龄(AGE)对耕地撂荒具有负效应,与理论模型中相关假设一致。说明越年轻的农户收集信息和学习技术的能力越强,他们往往倾向于选择撂荒耕地,通过外出务工来获取更高的收益。而年龄较大的农户由于各方面的原因缺少外出务工的机会,不得不选择以农业生产收入来维持基本生活。EXP(B)值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农户年龄每减小1岁,其耕地撂荒的可能性将增至原来的0.208倍。

在理论模型中我们预测受教育程度(EDU)与

耕地撂荒正相关。但计量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其系数为负。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户知识更加丰富、素质较高、获取市场信息的能力较强,在目前惠农政策的引导下,他们更愿意增加对农地的资本投入,以获取更多的农产品和更高的农业收入^[22]。EXP(B)值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农户受教育程度每提高1个层次,其耕地撂荒的可能性将减少到原来的0.950倍。

我们选取的健康状况(HEAL)这一因素进入了回归模型,并成很强的正相关性,说明农户健康程度越高,劳动力这一要素在农业生产中的投入越充分,农户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越高,从而提高了耕地的集约利用程度,减少了耕地撂荒现象的发生。

个人特征因素4个指标的回归系数和显著性水平大小表明,农户年龄因素较其他因素影响更大。以上结论表明:①农户的健康状况和受教育程度对其耕地撂荒行为有一定的影响,政府要加大对农村教育培训、医疗保健的投入,满足农村居民在这两个方面的基本需求;②在我国农村地区,由于年轻劳动力非农转移而引发的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对耕地利用效率的影响重大^[23];③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自由转移,使得土地的保障功能对青壮年劳动力趋于弱化,从而引发了耕地利用效率损失。因此亟待制定刺激以青壮年农业劳力为主的农户增加资本和劳力投入的政策以提高他们的耕地利用效率,或者激励耕地资源向耕地利用效率较高的农户流转^[24]。

(2)经济因素对耕地撂荒的影响。经济因素所有分指标中除农业收入占总收入比率(AINCR)这一因素没有进入回归模型外,生产资料费用占总支出比率(PRODR)、家庭全年总支出(TEXP)和家庭全年总余额(SUM)3个指标的回归结果与预测一致并且都比较显著。

中国农村居民经济收入来源复杂,并且在农业和非农业收益的博弈下,越来越多的农户选择了“弃耕务工”,部分耕地被撂荒的农户根本没有农业收

^①农户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对模型的解释力度说明了农户(微观农户)这一决策主体的个人特征对耕地撂荒具有显著影响。

人,导致农业收入占总收入比率这一因素对农户耕地撂荒行为的影响不显著。

农户对农业生产的资金投入越高,农业生产的收益越高,出现耕地撂荒的可能性越小。在我国目前的经济体制下,农业收入普遍低于非农业收入,家庭总支出或总余额越高,该家庭从事非农工作的机率越大,从而耕地被撂荒的机率越大。这充分说明了农户是“理性人”,其是否选择农业生产,以及其农业生产的投入量和积极性都受农业比较收益的影响。从第 3 个模型的 EXP(B)值来看,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农户生产资料费用占总支出比率每降低 1 个百分点、家庭全年总支出或家庭全年总余额每增加 1 万元,其耕地撂荒的可能性将分别提高到原来的 1.035 倍、1.068 倍或 2.034 倍。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①目前我国农业生产效益的提升空间较大,国家应制定更多维度的激励政策和扶持政策促使农业增产、农户增收;②近十多年,我国农户的家庭支出快速增长的同时,耕种农作物的收入增涨却缓慢甚至停滞不前^[8];农户仅靠农业生产收入根本不能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迫使农民弃耕外出谋求更多的收入;③农户作为理性人,其家庭全年总余额达到一定数目后,在经济收益最大化的诱使下,将倾向利用这部分资金经商或创业来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

(3)家庭劳动力配置对耕地撂荒的影响。选取的指标有劳动能力的人数(HLAB)、参与劳动生产的人数(ILAB)和劳动力外出量(OLAB)均未进入回归结果。本文就这一结论开展了进一步文献分析与调查研究,并得到如下结论:①人口红利^①对耕地利用的作用方向是不确定的,其影响也不是独立的,即使有劳动能力的人数很多,其对耕地利用的影响也需要适当的诱导机制和替代性生产要素^[25];②劳力结构对耕地利用效率产生正的影响,其显著性也

受制于耕地资源禀赋;在耕地资源丰富的地区,该因素的作用不显著;在耕地资源贫乏的地区,其作用显著^[22];③将所有的样本按照不同经济区域划分^②后研究发现,中部地区劳动力外出量与耕地撂荒有非常显著的负相关性。这呼应了杨钢桥等学者的研究结论——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劳动力因素对农户耕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呈现出地区差异^[24]。

(4)社会制度框架对耕地撂荒的影响。选取耕地是否流转(TRAN)、是否参加医疗保险(MINS)和是否参加养老保险(EINS)3 个分指标来进行分析。

从计量模型的结果来看,是否参加养老保险对耕地撂荒的影响方向与预测方向一致,并且影响十分显著,这充分说明我国耕地撂荒与我国农村不够完善的养老制度有密切关系。而耕地撂荒行为与是否参加医疗保险有微弱的负相关性。目前,我国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健全,除了绝大多数农户享有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外,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较低,农户养老保险覆盖率低,很难解决农民的养老保障问题,所以养老保险制度对农户耕地撂荒行为的影响更大^[18]。

从表 2 得知 3 个模型中耕地是否流转对耕地撂荒均成负相关性,并且其回归系数均通过了 1% 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也就是耕地的流转程度越高,出现耕地撂荒的可能性越小。并且第 3 个模型 EXP(B)值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已流转耕地造成撂荒的可能性是未流转耕地造成撂荒可能性的 14.6%。

社会制度框架 3 个指标的回归系数和显著性水平大小表明,耕地是否流转相对农户是否参加养老保险和是否参加医疗保险两个因素影响更大。以上结论表明:①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能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土地的保障功能,促进土地流转,减少耕地撂荒;②目前,我国农村的社保体系不健全,社保制度

①有劳动能力的人可以称作农户家庭的人口红利。

②本文基于区域经济理论及《中国统计年鉴》的划分方法,将我国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等 11 个省(区、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 8 个省(区、市);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等 12 个省(区、市)。

存在保险项目少、水平低、覆盖面积小、财政供给不公平等特点,进城农民无法享受到与城市职工相同的各种社会保险,农民不敢轻易放弃作为生存保障的耕地,存在较重的“离乡不离土”思想,倾向于粗放经营或者抛荒^[18];③和完善农村社保制度相比,健全的土地流转制度更能减小农户耕地撂荒的可能性。由于,在我国农村即使农户有土地流转的意愿,也受到土地产权的不明确,土地流转的法律法规不健全,市场发育不完善等因素的影响,从而出现土地流转不畅型撂荒^①。目前,以市场调节为基础,通过土地流转,对土地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已经成为提升农业竞争力的一种途径^[27]。

4 结论与启示

在“理性人”假设的理论框架下,假设农户的耕地撂荒行为很大程度上与自身因素和外部因素有关,并结合2010CGSS数据探究影响其撂荒行为的因素,再通过建立计量模型进行验证。通过比较分析可以发现,确如现有文献所描述,有多种要素促使农户对耕地进行粗放经营,具体包括农户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等个人特征因素,养老保险制度和土地流转制度等制度因素,生产资料费用占总支出比率、农户家庭总收入和总余额等经济因素。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果,我们主要得到如下启示:

①我国应及早制定对农村青年劳动力的专项扶持政策,并加强对青年农民的技术培训;②提高农户对保护和集约利用耕地的认知程度,并辅以可行的耕地保护激励政策;③继续增加惠农政策对农业的扶持,努力提高农民农业收入比重,并加大农村教育和医疗设施的投入,提高农村劳动力这一核心要素的综合素质;④健全土地流转机制,减少土地流转不畅型撂荒行为的发生,并依据各地社会经济条件和资源禀赋制定差异化的土地有偿流转政策及其对应的辅助政策;⑤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弱化土地的保障功能。

参考文献:

- [1]陈锡文,韩俊.如何推进农民土地使用权合理流转[J].中国改革:农村版,2002,(9):35-37.
- [2]田富强.试析耕票制度与有效遏制耕地季节性抛荒[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1,32(5):611-614.
- [3]谭术魁.耕地撂荒程度描述、可持续性评判指标体系及其模式[J].中国土地科学,2003,17(6):3-8.
- [4]田千禧,徐植兰.农地弃耕抛荒的生态经济学分析及其对策[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4,25(2):127-130.
- [5]郑兴明,吴锦程.基于风险厌恶的农户弃耕撂荒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福建省农户调查为例[J].东南学术,2013,(1):89-96.
- [6]蒋玲珠.农村耕地抛荒的原因分析[J].中国统计,2004,(12):38-39.
- [7]郝鼎玖,许大文.农村土地抛荒问题的调查与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0,21(12):10-12.
- [8]李中豪.农地抛荒的生成机理与我国农地制度的创新路径[J].农村经济,2013,(6):33-36.
- [9]曹志宏,郝晋珉,梁流涛.农户耕地撂荒行为经济分析与策略研究[J].农业技术经济,2008,(3):43-46.
- [10]谢秋山,赵明.家庭劳动力配置、承包耕地数量与中国农民的土地处置——基于CGSS 2010的实证分析[J].软科学,2013,27(6):59-68.
- [11]Viki A Cramer, Richard J Hobbs, Rachel J Standish. What's new about old fields Landabandonment and ecosystem assembly [J]. Trends in Ecology and Evolution,2008,23(2):104-112.
- [12]Baur B, Cremene C, Groza G, et al. A effects of abandonment of subalpine hay meadows on plant and invertebrate diversity in Transylvania [J]. Biological Conservation,2006,132:261-273.
- [13]Jennifer J Schulz. Abandonment of agricultural land: an overview of drivers and consequences [J]. CAB Reviews,2007,56:1-13.
- [14]Peteris Busmanis, Aija Zobena, Inga Grinfelde, et al. Privatisation and Siol in Latvia-land abandonment[A]. The Environmental Effects of Transition and Needs for

①张安录根据耕地撂荒的原因,将耕地撂荒现象区分为自然生态型撂荒和社会经济型撂荒两种类型。土地流转不畅型是社会经济型撂荒的一种,主要是指由于土地产权的不明确不清晰以及土地使用权流转机制的不顺畅,导致的撂荒现象。

- Change[C]. Nitra, Slovakia, 2001.
- [15]周丽娟. 农户耕地撂荒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宜宾市南溪区的调查[D]. 雅安:四川农业大学, 2013.
- [16]舒尔茨. 改造传统农业[M]. 梁小民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6.
- [17]Samuel L Popkin. The Rational Peasant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 [18]钟晓兰, 李江涛, 冯艳芬, 等. 农户认知视角下广东省农村土地流转意愿与流转行为研究[J]. 资源科学, 2013, 35(10):2082-2093.
- [19]肖冬华. 耕地抛荒问题研究[J]. 云南农业大学学报, 2009, 2(1):25-30.
- [20]马国忠. 土地承包的稳定性和土地抛荒的现实性[J]. 农村经济, 2008, (7):43-45.
- [21]刘润秋, 宋艳艳. 农地抛荒的深层次原因探析[J]. 农村经济, 2006, (1):33-34.
- [22]阚西浔, 周莹, 杨钢桥. 家庭结构对农户耕地资本投入的影响——基于 488 份农户调查问卷的分析[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5):86-92.
- [23]宋斌文. 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老龄化的影响及其对策建议[J]. 公共管理学报, 2004, 1 (2):74-79.
- [24]杨俊, 杨钢桥, 胡贤辉. 农业劳动力年龄对农户耕地利用效率的影响——来自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实证[J]. 资源科学, 2011, 33(9):1691-1698.
- [25]蔡昉. 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J]. 人口研究, 2004, 28 (2):2-10.
- [26]杜凌坤.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差异及统筹改革[D]. 厦门:厦门大学, 2009.
- [27]张丁, 万蕾. 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 2004 年的 15 省(区)调查[J]. 中国农村经济, 2007, (2):24-34.